

追求解脱中的苦痛心迹

——陶渊明“遇火”后的园田诗探微

武宏璞

(陕西理工学院 文学院, 陕西 汉中 723001)

[摘要] 陶渊明园田诗饱含着诗人诸多的积郁与苦痛,特别是义熙四年的火灾使陶渊明完全走进了郁闷、苦痛的心理体验。《饮酒》组诗是他田园生活复杂、多重感受的记录。就火灾始至义熙十四年刘裕幽安帝而立恭帝前这一时段来说,诗人始终未能忘却“先师遗训”,更未“常常达到物我一体、与道冥一的人生境界”。恰是这“未能达到”,彰显出了陶渊明作为一个社会个体的真实及其人格的崇高与伟大。

[关键词] 陶渊明; 园田诗; 火灾; 苦痛; 嬗变; 追求; 崇高

[中图分类号] I206.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2936(2011)01-0056-04

历经风雨洗礼,陶渊明“田园诗之宗”的地位得到了世人的肯定,叶嘉莹认为“渊明最可贵的修养,乃在于他有着一种‘知止’的智慧与德操。在精神上,他掌握了‘任真’的自得;在生活上,他掌握了‘固穷’的持守,因此他终于脱出了人生的种种困惑与矛盾,而在精神与生活两方面都找到了足可以托身不移的止泊之所。”^[1]殊不知,我们对诗人这一简洁而崇高的评价的后面,却饱含着诗人诸多的郁闷与苦痛。仅自义熙四年(公元408年)火灾始至义熙十四年(418年)刘裕幽安帝而立恭帝前这一时段陶渊明的诗文,我们便可以解读到:那场火灾,逐渐把诗人的郁闷嬗变为苦于农事的悲叹,因为诗人归园田之后未能放下“先师遗训”而念念不忘“士志于道”的传统追求,起码就这一时段来说,他的田园生活实际上是郁闷、苦痛的心理体验过程。

一、火灾后园田诗之“旷达”的苦涩本质

陶渊明归园田的第四年六月那场大火使他陷入了困窘的境地。据《戊申岁六月中遇火》来看,这场大火烧得相当彻底,“正夏长风急,林室顿烧燔”,昔日沾沾自喜的“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的桃源美景不复存在,陶公只好暂栖于门前小河里的船上。二十几天后将近中秋的某一晚上,陶公“中宵伫遥念”,这一“遥念”的思维转换的基础是:现在,果菜始复生,惊鸟尚未还,郁闷难以排遣;过去,四十年孤介,贞刚自质,比玉石还要坚硬;上古,东户时代,鼓其腹而无忧,朝起暮归;现实,不遇兹时,且遂灌我园中蔬。我们先来审视诗人思维转变的过程:首先,由不能还旧居屋舍的眼前现实,思及几十年的孤介个性,且用了长长的六句介绍。那么,催生这一思维转变的媒介是什么?诗人眼前,一边是无家可归的现实窘境,一边是比玉还要硬的孤介,这双方显然是不和谐的。这一不和谐表明:陶公对当前的田园生活本身就不太满意,遭此火灾,迫使诗人对自己的田园生活产生了怀疑,在《祭从弟敬远文》中陶渊明曾说“敛策归来,尔知我意,常愿携手,置彼众议。”可见陶渊明辞官归来支持者不多,反对者却不少。在

[收稿日期] 2010-12-06

[作者简介] 武宏璞(1972-),男,河南邓州人,陕西理工学院文学院2008级古代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古代文化与文学。

此思维转换之前,诗人必将想起“众议”,用了六句叙说孤介的个性,他是很介意此事的。第二个思维转变是:由平生孤介个性的回忆转入东户时代的遐想。这一转变的思维基础当是他对现实生活的不满,这一不满当然包括他归于园田的生活在内。如果诗人真的超然步于山水之中,何以对东户时代充满了遐想?第三个思维转变是由东户时代的遐想又回到现实生活。对东户时代的遐想是诗人面对一片瓦砾的园田废墟产生的冷静思考:没想到园田生活竟是如此糟糕,远不如东户时代无忧无虑;然而,那样的时代根本不会再回来了,又没有别的途径,我还是老老实实干我已经不再新鲜的园田耕耘吧!我们必须明确的是:第一,此诗乃火灾二十多天后所作,此际初失居所的惊慌失措业已消失,那扯心裂肺的痛楚已经变成冷静的思考。第二,此变故是自身原因造成,陶渊明没有怨天尤人的借口。第三,魏晋时代,特别是东晋时代,“在宗族之间,最重要的要算经济生活上的‘通财’关系,而这种关系是包括多方面的:或由富宗分钱谷给贫宗,以解决生活困难;或由宗族官僚分俸禄给宗族成员;或分土地给贫宗耕种……”^[2]。曾经名噪一时的陶氏家族并不是一个穷得叮当响的宗族,《宋书·列传第六十四》载陶渊明的叔父陶淡“家累千金,僮客百数”,可见陶氏家族并没有完全淡出历史舞台,由于“通财”制度的存在,陶渊明失去园田的心理压力会相应减少。因此,纵观全诗,没有失去家园的惊慌失措,也没有遭此横祸的悲天悯人,因此历代陶学研究者及其爱好者,无不认为“基于死生祸福之际,平日看得雪亮,临时方能处之泰然与强自排解,貌为旷达者,不啻有霄壤之隔”^{[3]142},这当然是没有此种生活经历之人作的一厢情愿的解读。这首诗作实际上是初失家园的惨痛淡化后又冷静思考之后的创作,是诗人痛定思痛的产物,暗含着陶渊明无可奈何的郁闷心情。

陶渊明家庭变故后的生活困窘与郁闷心态,他随后的作品《和刘柴桑》(409年)有着明白的显露。开头四句酬和之语,不足见陶公心态。“良辰入奇怀,挈杖还西庐。荒塗无归人,时时见废墟”颇有深意:美好的时光激荡着诗人的心怀,但涌入视野的却是“荒塗”、“无归人”,并且时常看到“废墟”的存在。“良辰”、“奇怀”与“荒塗”、“无归人”、时见的“废墟”的反差对比足以证明:社会动荡,战乱无数,满目民生之凋敝、田园之荒芜,使陶渊明对战争产生了厌恶之情、不满之意,足见他并没有“虽寄世中,却游人外”^{[3]88},他是关怀政治风云的变幻和黎民百姓的疾苦的。“茅茨已就治”六句,诗人叙说的是他当时的生活状况:烧毁的房屋已经修葺一新,新开辟的荒地也到了耕种的时节;东风渐转凄厉而直逼身体,暂借春酒解除劳作之苦,同时御寒;此时虽没有称心如意的好酒,但总比没有强啊!这与初归园田之际“漉我新熟酒,只鸡招近局……欢来苦夕短,已复至天旭”(《归园田居》)的热闹场面和欢悦情愫形成了强烈的反差。诗人退而求其次足以说明那场火灾的潜在影响已经暴露,诗人的生活条件业已恶化,他逐渐消失了初归园田那“载欣载奔”(《归去来兮辞》)、“复得返自然”(《归园田居》)的喜悦,不得不正面园田耕耘的辛苦与无聊,这一感受必将随着时日的推移而不断地加强,必将在他随后的创作中表现出来。

二、园田生活苦痛的渐强

如果说火灾给陶公引发的苦于农事在《和刘柴桑》里还不够透彻,那么在同年诗作《己丑岁九月九日》中能让我们看得更清楚一些。我们先从诗作后半“万化相寻绎”八句入手,来追寻诗人的心灵轨迹:草木有悴有荣,寒暑有往有来,化则化矣,唯人生化去则无归期;自古有生有死,念及此处心中万分焦灼。眼前的一切都是触痛我心的媒介,那么有什么可以使我称心如意呢?没有啊,姑且举杯喝下这浊酒而得以暂时的自足自乐吧!最后,诗人又回到了及时行乐的主题。能够触动、引发此种感慨的绝对不是理想化的“蝉们去得很干净,丛雁从得可爱,丛字也是对上文草木凋落的回应:自然界总是丰盈的”^[4],而是首二句中“凄凄”二字,对此二字的理解是判定该诗感情基调的关键。《小雅·四月》:“秋日凄凄,百卉俱腓”,注释:秋风寒凉貌。《郑风·风雨》:“风雨凄凄,鸡鸣喈喈”,该诗中的“凄凄”比兴的是忧思。对照陶渊明《癸卯岁十二月中作与从弟敬远》中的“凄凄岁暮风,翳翳经日雪”来读,可以从“凄凄”二字上感受到寒意袭人之感。在这凄风寒露之下,蔓草渐趋衰败,树木黄叶飘零;蝉声的消失,丛雁的南来,告诉诗人:岁月在如箭般流失啊,有生之年,功在何处?诗中由“万化相寻绎”而结出“人生岂不劳”的感慨,这一“劳”字,必然有躯体劳累与内心疲惫的双层含义;这一“劳”字,我们可以隐约看到陶渊明苦于

劳作之甚的影子。

此一处“劳”字尚不能说明问题,诗人于次年所作的《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410年)所表现出的苦于农事的心态显然加强了。开首四句强调了生活资料生产的必要性,接着四句叙说田间劳作。那么诗人田间劳作的心情怎样呢?“山中饶霜露,风气亦先寒”,涌入视野的是诸多的霜露,诗人的感觉是:时令未到,已经“先”寒冷了——我们要注意这一“先”字。当时是九月中旬收获季节,注入诗人笔端的不是累累的秋实的可喜,亦不是“飞鸟相与还”那初归园田的欢悦,而是诸多霜露及先行寒冷的气候。时令季节的更替有恒定的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先寒”只是诗人独特的感受,这一感受就是“田家岂不苦?弗获辞此难”。反问语气加重了“苦于农事”的苦的程度,再补充说身为田家脱离工作之苦是不可能的。创意不大、成就感不多的乏味的重复性劳动,已经完全夺走了“既耕亦已种,时还读我书”(《读山海经》其一)的那种新奇与喜悦,他深深地感受到了园田躬耕的苦与累。怎样来化解这园田躬耕的苦与累呢?诗人说“四体诚乃疲,庶无异患干”,四肢诚然疲劳,但这可以免除祸患上身,这是诗人擅于使用的转移视线的方法娴熟地由劳累的幽怨转为田园生活的自适。由此清孙人龙认为此诗“起说有道,为获稻占地步。语意婉转,深于人世语”^{[3]147},方宗成认为“陶公高于老庄,在不废人事人理,不离人情,只是志趣高远,能超然于境遇形骸之上尔”^{[3]148},诸如此类的认识,显然犯了“以文害辞”之病。诗作最后,诗人以沮溺自比,并且安慰自己“但愿长如此,躬耕非所叹”,我们必须明确:第一,由“非所叹”可见诗人在此承认了自己对农事之苦的感叹,而加上“非”字足见诗人感叹的无可奈何;第二,由前面的分析我们可以断定,诗人“但愿长如此”不是油然而生,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信手拈来完全不同,而是基于对农事的无聊苦闷的亲历与认识之后无奈的悲吟,是极不自然的,是诗人借以转换痛苦的自慰。清蒋熏有语“先生西田之作,语意自见,不同田家了也”^{[3]150},我认为,不同于田家之处恰在于诗人作为知识分子能够把自己的苦闷诉诸于笔端、形之于诗文。

家庭变故(火灾)八年后的晋义熙十二年(414年),陶渊明作《丙辰岁八月中于田舍获》,此作已经证明诗人真正“颇为老农”(《有会而作序》)了。开首四句便足见诗人心态的变化:我如今贫贱隐居于田园,只得靠耕耘维持生计;且不说春日耕作的劳苦,我担心的只是秋季的收成好与不好,是不是会辜负我们农人的希望——诗人的心已经踏踏实实与园田的收成联系到一起了,“思想感情和劳动人民已经完全打成一片,封建文人的气味确实不多了”^[5]。“司田眷有秋”四句,诗人面对不负所获的秋收的喜悦之情溢于言表,不可禁收,特别是“束带候鸣鸡”一句,表明诗人已经和农人的心态相差无几了。“扬楫越平湖”四句写赴田野途中所见所闻,此时映入诗人眼帘与心灵的,不再是初归园田时那么靓丽、欢快,亦不如初遭火灾之后那么清冷,只是述说“郁郁荒山里,猿声闲且哀”,其实,“闲且哀”正是诗人对自己园田生活的概括。“悲风爱静夜”,静夜本在静着,悲风偏偏扰乱这夜的静谧,这其实恰是诗人自己愁而不寐、闻风心酸:原本以为归于园田可以过着闲适的生活,又谁料有火灾的变故、疾病的缠身、食物得不到保证……恍惚中熬到了天明,忽然听到林间鸟儿欢快地鸣叫,紧皱的眉头才得以舒展。最后六句,诗人以惯用的“凭化迁”的手法而试图把心头的积郁荡去,实际上那只是外在表现形式的自慰。从整体来看,诗人对于安于田间劳作、寄厚望于田间收成的述说相当认真、实在,毫无假饰,颇为老农。直到“悲风爱静夜”一出,我们才明白诗人对于自己的园田生活是有着不少的哀怨的。这一哀怨与初事园田时的心态相比,已经趋于平和、理智。把此诗与前两首相比较,我们会发现:词语的色调变化很大,蕴含的情愫有很大的反差。劳动的艰辛,天灾人祸的威胁,与自己最初想象的完全两样,“四体诚乃疲”的生活的感受,绝对不是咏诗弹唱那么可心。“做出人生选择是一回事,面对这一选择导致的后果是另一回事,后者不象前者那样激动人心,可是对一个人的生活来说非常重要。在弃官回家后,如果意外地发现家居生活和官场生活同样令人烦恼,该怎么办呢?或者更糟:如果家本身原来只是一个短暂已逝的幻想,又该如何。”^{[4]83}做出归园田的选择是激动人心的,而选择之后的结果对诗人的生活、心态和创作的影响与归园田选择的新鲜感来说是完全不同的;对于自少年便有壮志且颇有思想深度的人来说,农耕生活中的重复性劳动所滋生的无聊和伤感是在所难免的。我们如果一味地夸大诗人园田生活的自得与悠闲,那必然会在淡化诗人念念不忘的“先师遗训”的志向的同时,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诗人关注民生与社会的人格价值。我们不能以文害辞地赞同谭元春的认识,“无一字不怡然自得,生涯性情,矫作不

来”^{[3]149}；更不能相信邱嘉穗说的“不苦春作，恐负本怀，故早起泛湖而获，愿从丈人终老也”^{[3]150}，这显然违背了诗人内心世界的真实。

以上三首诗作与初归园田的诗文相比，无论是写景还是抒情，陡然增多了冷色调，逐渐消去了欢快的暖色调；于诗作结尾处，虽然用到了“凭化迁”的惯用手法试图化解这与园田追求不协调的郁闷，但无论如何也化解不去诗人“苦于农事”的心迹。

三、《饮酒》组诗所映像的积郁之痛

陶渊明的田园生活感受是复杂的，这在组诗《饮酒二十首并序》(417年)表现得比较全面。黄仲仑《陶渊明作品研究》将该组诗分为六类：①壮志篇，之十；②高雅篇，之一、二、四至九、十二、十四、十七、十八；③归与篇，之十九；④固穷篇，之十五；⑤任真篇，之三、十一、十三；⑥尊孔篇，之二十、十六^[6]。从所分类别便能看出陶渊明园田生活的心态的复杂性。“壮志篇”之十，与《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404年)、《乙巳岁三月为建威参军使都经钱溪》(405年)相比，诗人此时已经冷静多了：不再用那么多的冷色调的词语，宦游之叹不再那么强烈，情绪也不再那么激昂，只是平静道来。这说明：历经田园耕耘的磨练，陶渊明已经体悟出了园田生活并不是那么天真、浪漫，它和仕途一样有着枯燥的另一面，更重要的是田园生活是与自己“仕而达济天下”的理想相悖的。“高雅篇”其四中所含的悲感情愫最浓“栖栖失群鸟，日暮犹独飞”，黄昏时分，一只离群的鸟还在独自飞翔，它形单影只，栖栖惶惶，疑惧不安地在天际徘徊，找不到可以栖止休息的地方，它的啼声也越来越悲凉感伤。这飞鸟显然象征着诗人自己前半生的栖栖惶惶，以及归田园后遭遇到的天灾人祸的不幸。“失群”、“独飞”、“徘徊”、“转悲”，字字含泪，词词触目惊心，可见陶渊明难以掩灭的“仕而达济天下”的壮志依然在。“尊孔篇”之二十叙说自己好六经，深受儒家思想教养，然而“行行向不惑，淹留遂无成”。时光荏苒流逝，渐近老迈之年，仕途不进，一事无成，可见陶渊明对不能够“仕而达济天下”的怀念。诗人接来说“敝庐交悲风，荒草没前庭”，秋风吹破旧的房屋，荒草生满门前的庭院“披褐守长夜，晨鸡不肯鸣”，披衣坐守长夜，长夜漫漫，晨鸡不肯报晓，是因为夜寒而无眠，更是由于诗人内心的幽怨而不寐。时代愈黑暗，志士愈孤独，受到“圣贤不得通其道”的煎熬愈炽烈。李泽厚认为“通过酒这个糊涂的东西来韬晦自己，来化解人生的种种感伤、焦虑、痛苦，获得少许的慰藉……在酒和自然的共同作用下，陶渊明理想不得实现的悲剧意识消失了，人生苦短的哀叹不见了，总之，外在的世界消失了，只剩下了一颗通体澄澈的心灵，而这个心灵也没有了外在的堤防与界限，已与自然融合在一起，在大化中自然而然地运行。”^[7]其实，举杯浇愁愁更愁，饮酒恰是为了排遣胸中的郁闷，萧统说“有疑陶渊明之诗，篇篇有酒，吾观其意不在酒，亦寄酒为迹也。”^[8]清人方东树说：“借饮酒为题耳，非咏饮酒也。阮公(阮籍)《咏怀》，杜公(杜甫)《秦川杂诗》，退之(韩愈)《秋怀》，皆同此例，即所谓遣兴也。”^[9]由此可见，陶渊明饮下去的一杯杯酒水，恰是他壮志不得伸展的或低或高的人生咏叹，是他借以消解郁闷与痛苦却更加郁闷与痛苦的心路历程，更是他虽归于园田但不忘社会、忧心民生的崇高人格的有力见证，他并没有真正“与自然融合在一起，在大化中自然而然地运行”。

托尔斯泰认为“艺术是一种人类活动，其中一个人有意识地用某种外在标志把自己体验的情感传达给别人，而别人被这种情感所感染，同时也体验到这种情感。”^[10]陶渊明的创作也不例外，我们由他这一时段的诗文的解读完全可以确定：从家庭变故后的苦于农事到困守园田的无奈咏叹的历程，书写着他直面田园生活心理节奏的嬗变；诗人逐渐地认识到岁月的更替，社会的变化，生命的衰老终结，是个人所阻挡不了的，自己的“先师遗训”只是安慰自我不成却加剧郁闷的主要因素。这一切都证明：归隐后的陶渊明始终没放下他“千里虽遥，孰敢不至”(《荣木》)的理想，随着岁月的流逝、苦难的更迭，他的决心与壮志的表达方式由激昂渐趋低迷。其园田生活并不象罗宗强先生所说的“常常达到物我一体、与道冥一的人生境界”^[11]那么简单，起码这一时段来说，陶渊明未能达到，也恰恰是这一“未能达到”，才能彰显出陶渊明作为一个社会个体的真实以及诗人人格的崇高与伟大。我们不能为了拔高诗人作为“隐逸之宗”、“田园诗之宗”的地位而淡化诗人“士志于道”而不得的伤痛的心灵世界，从而忽视了诗人对世人积极人生方面的感化与教育的作用，这与诗人的本意是相悖的。

(下转第74页)

- [5]黄英.段玉裁《诗经》“古合韵”考论[J].四川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00(6).
[6]吕胜男.再谈《诗经》之耕、真合韵[J].天中学刊,2009(1).
[7]刘忠华.段玉裁语音“变转”理论探索[J].陕西理工学院学报(社科版),2010(3).
[8]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六书音韵表四[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9]段玉裁.诗经韵分十七部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10]钱毅.诗经特殊韵字分析[J].邵阳学院学报,2005(5).
[11]王力.诗经韵读[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12]郭云生.论《诗经》韵部系统的性质[J].安徽大学学报(哲社版),1983(4).
[13]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六书音韵表三[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14]赵诚.上古谐声和音系[J].古汉语研究,1996(1).
[15]段玉裁.说文解字注:鸟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16]段玉裁.说文解字注:辵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17]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六书音韵表一[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18]段玉裁.说文解字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19]吴顺泽.汉语音转研究[M].长沙:岳麓出版社,2006.
[20]周长楫.通假字“音同”原则浅说[J].古汉语研究,1998(1).
[21]袁家骅.汉语方言概要[M].北京:文字改革出版社,1989.
[22]十三经注疏:尔雅注疏[M].北京:中华书局,1980.
[23]钱绎.方言笺疏[M].北京:中华书局,1991.
[24]李恕豪.论段玉裁的古音研究[J].四川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1987(6).

[责任编辑:朱飞]

(上接第59页)

[参 考 文 献]

- [1]叶嘉莹.迦陵论诗丛稿[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146.
[2]朱大渭,刘驰.魏晋南北朝社会生活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34.
[3]北京大学中文系.陶渊明资料汇编(上)[G].北京:中华书局,1962.
[4]田晓菲.尘几录——陶渊明与手抄本文化研究[M].北京:中华书局,2007:297.
[5]钟优民.陶渊明论集[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148.
[6]黄仲仑.陶渊明作品研究[M].台湾:帕米尔书局,1970.
[7]李泽厚.美的历程[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130.
[8]萧统.陶渊明集序[M]//郁沅,张明高.魏晋南北朝文论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335.
[9]方东树.昭昧詹言[M]//王洪,田军.古诗百科大辞典.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91:1080.
[10]托尔斯泰.艺术论[M].丰陈宝,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146.
[11]罗宗强.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M].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2005:272.

[责任编辑:朱飞]